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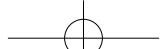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1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学术简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 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 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 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其所长，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研究院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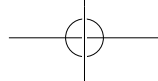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2018年4月12日

一、揭牌仪式

2018年4月12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教育部国际司副司级参赞陶洪建，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施子海，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胡江云，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冬育，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小娟，以及来自校内外的近200位学者代表出席了会议。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揭牌仪式。林建华校长首先发表致辞，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背景和必要性，细数了当前北京大学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上的优势与挑战。林校长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从一个区域性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这就需要我们的学术从主要关注自身转向关注世界。同时近几年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学术界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他强调大学和研究机构应为国家发展提供学术和人才支撑，北京大学一直把区域与国别研究视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并在早期开展了一些人才培养的探索。如今在新一轮“双一流”战略规划契机下，北大在学校层面设了三个重点领域，希望将各学科整合进来，它们分别是：“临床医学+X”；“区域与国别研究”；“数据科学和智能科学”。林校长特别提到，希望人文社会科学教师不仅关注自身的研究领域，也要关注国家的发展，并且关注今天的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



林校长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语言教学与其他知识相分离；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相脱节等。因为如此，学校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平台，帮助老师们既把自身的学问做深，又关注更广、更大的空间，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就是为此服务的。事实上，北大在前期已做出了跨学科综合的尝试，如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林校长认为学术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而应在中国的实际、世界的实际中寻找问题，这就意味着未来研究队伍的建设，不仅限于聘请学校培养的人才，还应聘请一些在实践中有优秀经验的学者。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让世界读懂中国，要建立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对此，林校长指出若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关注中国的实际问题，关注世界的实际问题，而这些艰巨的任务需要高校的努力和合作。他对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寄予厚望，希望这个平台是对国内国外开放的平台，并在培养优秀年轻学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提供战略咨询发挥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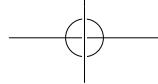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林建华校长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颁发了聘书。王博副校长宣布研究院其他领导成员名单：宁琦教授为常务副院长；张辉教授、咎涛副教授、翟崑教授、夏红卫部长任副院长；李昀博士任办公室主任。

钱乘旦教授代表研究院介绍建设方案。钱院长围绕三个方面进行汇报：首先是“为什么研究”。他指出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瞬息万变，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大的变动，国际格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而在这些重大变化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变化，它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中华民族经历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认真应对这些变化，而应对的前提是了解，了解世界已成为当务之急。尽管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便睁眼看世界，但受制于种种因素及条件不足，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已与世界密

不可分，这就要求我们准确了解世界，了解世界每一个国家和所有地区，而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了解世界和研究世界的学术工具。钱教授表示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教育部也在几年前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专家委员会，全国许多高校相继成立研究机构，而北京大学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标志着北京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提升到学校建设的层面。

其次是“北大的优势”。钱教授认为北大自建校之日起就敞开大门，与世界的变化同步而行。他详细回顾了北京大学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无论是有着优良传统的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和外国语学院，还是新兴的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经管类学科和政管、教育、社会、新闻传播、艺术等院系，都有大批从事外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做出了许多成绩。但在现有行政体制和学科体系的配置下，人才和研究领域条块分割，不能形成综合的力量。为改变这种状态，北大在过去几年已经付出诸多努力，做了许多资源统筹的工作和跨学科合作的探索。2016年在校领导直接指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委员会，统筹规划建设，现在北大已有约50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覆盖世界主要地区，这些都是今后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他相信在此丰富资源积累的条件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将为北大全面的学科调整与战略升级做贡献。

最后汇报“我们做什么”。钱教授说，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后，将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学术研究。研究院将以学术研究为导向，重在基础性、独创性、前瞻性，做到理论与事实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研究院将打破现有的学科界限，启动以问题引领项目的多学科研究模式，组建跨学科团队，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核心作用，在研究过程中培养梯队、发现人才。研究院将尝试驻院学者与兼职教授制度，延揽各方人才，发挥各自特长，而且将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包括“天下论坛”、



“博雅工作坊”、“新芽沙龙”等，希望能通过这些活动，选择出研究课题，搜集研究成果，并出版期刊、专著以及系列丛书。

第二，人才培养。钱教授指出人才培养是工作的重点，是长远的目标。虽然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绝非易事，但研究院将努力为之，摸索新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他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新型人才应具有宽阔的知识结构，明确的学习方向，掌握英语及对象国语言，在宽广知识的基础上培养一至两门专业特长（如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获该专业学位，学成后既可承担实际工作，也可成为专门学者。

第三，智库功能。钱教授认为智库功能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不流于表面，不就事论事，而是在对文化、历史、民族特点、信仰体系等有深刻理解的前提下观察和剖析社会、经济、政治等状况，向政府和社会提供可供决策的思考方式。

第四，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钱教授承诺研究院将努力运用各种资源，做好交流工作，延伸学术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播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此他特别感谢来参加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第一次活动的各位师生，这是交流的开始，也是对研究院巨大的支持。钱教授深知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全体工作人员将加倍努力，努力工作，完成好这项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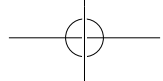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紧接着，北京外国语大学彭龙校长代表兄弟院校致辞。他表示，一个好的大学要关注过去和现在，但是更要关注和研究未来，北京大学在很多方面都是其它高校的榜样。彭校长回顾了国内高校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情况：国内一些学校很早就开始做国别研究，特别是外语类大学，像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但迄今为止成效仍不显著，与国家的期待不相称。

北外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传统上是外国语言文学。十多年前，郝平书记担任北外校长时就提出，北外的语种要达到90种，到他离开北外时，北外已建有57个语种。十八大以后，中央各部委非常重视北外多语种基地的建设，北外也注意到国别研究人才和语种人才的需要。通过几年的努力，北外目前开设的语种达98个，并且向教育部承诺，到2020年要开齐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开设语种要超过100种，而且每年要送数十位青年教师到这些国家去进行师资储备。区域和国别研究，仅使用英语是无法深入的。彭校长感慨道，这个过程十分艰难，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仅凭一个学校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他感谢北京大学长期把优秀学生输送给北外，其中很多都成为各领域领军人才。郝平书记当年提出，北外一直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视为自己的使命，而现在也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个方向对北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彭校长希望北京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成为全国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榜样，在发展中解决这个领域的诸多难题。他最后代表兄弟院校对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并期许研究院对国家的发展、人类的发展起到作用。

最后，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从智库功能的角度，对区域与国别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民进中央为什么建言在高校设立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刘新成副主席指出当代中国正从边缘走进世界中心，从全球治理的局外人、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口号的提出和“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这种国际角色转换的具体体现，其影响是世界性的。要完成这一角色转换，中国应主动地了解世界各区域、各国和各民族。他认为在高校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独特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高校相对于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超脱性，这有利于研究人员对国际问题做出相对独立、客观



的分析和判断；二是高校具有人才优势、学科优势、管理优势和对外学术交流优势，这些优势相结合，有利于对一些问题进行综合、深入、细致、持续的追踪调查与研究。

二、“说一说如何做好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这件事”。他表示首先要设定好功能和目标，一个好的中心，应该能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能对对象国、对象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深度解读；第二，能对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形势发展做出前瞻性预测；第三，能对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我国“走出去”和对象国“走进来”的路径提出有效建议，或为往来于双方的组织与人员提供有效的咨询。刘新成副主席强调中国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要有意识地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智库，不把研究对象国视为“敌手”，而是视为“朋友”，在合作交流中，各方都是平等的民主协商的参与者，互学借鉴，共同发展。他提出学校层面要注意几个问题，他特别指出北大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由校长亲自挂帅，聚合各学科力量共同进行，这个经验值得提倡。他认为研究院不仅要完成学校层面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的建设，同时还要建好人才库和信息库，并且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既要让智库按学术研究的路数发展，有科研机构的深度和广度，又要让智库面向国家需要和社会需要，有服务的广度和满意度。

刘新成相信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必将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好北大传统和优势，在服务国家全球战略部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推出更多质量精良、形式新颖的研究成果，进而在推动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方面大有作为。他最后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嘉宾发言之后，刘新成、陶洪建、林建华、钱乘旦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共同揭牌，现场掌声雷动，气氛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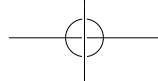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附录 1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致辞

尊敬的刘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揭幕仪式。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对区域与国家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刘主席，教育部、发改委、各个兄弟院校、国家留学基金委专家、国家外国专家局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着重要意义。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变化的关键节点上，将从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这就需要我们的学术从主要关注我们自身转向关注世界。当然，国家的变化很大，“一带一路”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学术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要为国家在整个世界的发展中提供学术和人才支撑，学术和人才支撑是我们重要的责任。北大一直都把区域与国别研究视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早期就在这个领域开展了一些人才培养的探索。这次结合新一轮“双一流”战略规划，北大在学校层面设了三个重点领域，我们认为这些领域不是一个项目，也不是要做一个具体的研究，而是希望将学校的各个学科都整合进来，这三个领域分别是：一是“临床医学+X”，希望各学科都要结合临床医学的需求来支持临床医学的发展，这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方向；二是区域国别。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将来不仅关注我们自己，关注我们自己每个教授的研究领域，关注我们国家自己现在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今天的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各个领域；三是数据科学和智能科学。我想这是我们学校将来进行重点学科调整的三个重要领域。



现在对于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巨大的挑战，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比如现在我们的基础语言教学虽然很多，但实际上和许多其他专业学科相分离；研究历史文化的很多老师做得很专、很深，但是可能与现实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距离还比较远。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通过一些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不仅把自身的学问做深，同时关注更广、更大的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除此之外，我们前期还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这在更广的领域上进行学术交流，带动年轻人，拓展年轻人的视野。还有最近刚刚成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我们希望这个研究研究能够就中国的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应该从中国的实际、世界的实际中找到一些问题，这也包括将来的研究队伍中，聘请的人不应该仅仅从学校门到学校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聘请一些在实践中有优秀经验的学者到学校担任教师。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让世界读懂中国，要建立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像这样的问题若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要关注中国的实际问题，关注世界的实际问题。

今天非常高兴，许多兄弟院校的同事们能够参加会议，我想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个广泛的合作。我觉得我们的平台应该是对国内、对世界开放的平台，一定要在培养年轻人、培养下一代优秀的学者上发挥更好的作用，为国家提供战略咨询发挥很好的作用。

最后，预祝研究院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尊敬的林校长，各位专家学者：

附录 2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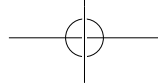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盛会，与各位新老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正式揭牌。我们民进中央作为建立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的建言者，看到实力雄厚的北京大学也来参与这一事业，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北京大学曾为我们国家的国际研究和决策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相信这次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必将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好北大传统和优势，在服务国家全球战略部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推出更多质量精良、形式新颖的优秀成果，进而在推动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方面大有作为！

在座各位都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专家，借此机会，我也谈谈个人的想法，就如何做好国别与区域研究问题向各位请教。无论从当初我们民进中央的建言还是我个人的思考，都主要从智库的角度来谈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供研究院将来建设的时候参考。

一是谈一谈民进中央为什么建言在高校设立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是一个复兴中的大国，我们的国家正在从边缘走进世界中心，从全球治理的局外人、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口号的提出和“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这种国际角色转换的具体体现，其影响是世界性的。要完成这一角色转换，我国不仅要改变当初积贫积弱、自顾不暇、无心也无力关注外部的状况，而且要主动地了解和理解世界各区域、各国和各民族人民，



包括其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信任系统、人情世故、时尚习俗等等，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合作和财富增长，更符合建设美好世界和人类家园的需要，而后者正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中“负责任”三字的基础。

在高校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有其独特优势，一是高校相对于相关涉外部委具有一定超脱性，这有利于研究人员对国际问题做出相对独立、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二是高校具有人才优势、学科优势、管理优势和对外学术交流优势，这些优势加在一起，有利于对一些问题进行综合、深入、细致、持续的追踪调查与研究。总之，高校有资源，有人才，特别是智库建在大学里，可以影响到下一代，影响年轻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真正形成，希望在于未来一代。

二是说一说如何做好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这件事。

首先要设定我们的功能和目标。我认为，一个好的中心，应该能做到这三点：第一，能对对象国、对象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深度解读；第二，能对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形势发展做出前瞻性预测；第三，能对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我国“走出去”和对象国“走进来”的路径提出有效建议，或为往来于双方的组织与人员提供有效的咨询。另外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尝试，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将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联系也纳入研究视野？

其次是积极开展新型的国际合作。以“一带一路”为例，“路”的方向是明确的，即参与国共同发展，宗旨是“相向而行，协商共赢”，所有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合作智库，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是平等的民主协商参与者，一起探讨全球化如何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中落实、如何互学互鉴、共同发展。我们国家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要有意识地区别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国

际智库，不把研究对象国视为“敌手”，而是视为“朋友”。不是与对象国互相揣测、猜疑，而是通过协商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本着这个原则，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研究中心将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智库，要探讨人类未来的走向，以及人类共同体如何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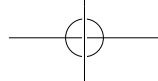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三是学校层面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说到这点时要特别感谢林校长，感谢他亲自在研究院挂帅，因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不是几个人或某一院所能够独立承担的，需要多学科聚集，比如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所以说它一定是个校长工程。与此相关还要完成学校层面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还要建好两个库：一是人才库，“旋转门”式地网罗和使用人才，不是都调入北大，而是掌握他们的信息和研究动态，需要时能及时纳入研究工作班子。二是信息库，报刊、资料、网站等等的积累建设，对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纵深研究的积累，等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基础薄弱和应用急迫并存，这是一对矛盾，我们要注意兼顾二者，既不可套用学术机构的理念建设智库，也不能片面追求领导部门和成果应用者的称许，既要让智库按学术研究的路数发展，有科研机构的深度和广度，又要让智库面向国家需要和社会需要，有服务的广度和满意度。

预祝我们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研究发展之路上取得丰硕成果！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附录 3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关于建设方案的汇报

在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之时，我代表研究院汇报今后工作。

一、为什么研究

出今的世界风起云涌、瞬息万变，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大的变动，国际格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近 20 年来，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我们看到朝鲜半岛问题变幻莫测；我们看到中东变局，战火燃烧至今不能平息，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我们看到欧债危机和难民潮，欧洲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新的选择；我们看到美国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下降；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它们的地区性影响和全球性影响日益凸显；我们看到俄罗斯走出了低估，正试图恢复大国的地位；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群起追求发展的权利，经济和科学发展正在改变这些国家；我们看到全球化既带来希望也带来困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对抗已经出现。总之，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中国的发展是所有这些变化中最大的变化，它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现在，在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正确地应对所有这些变化，而应对的前提是了解，了解世界已成为当务之急，是一项回避不了的任务。

平心而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努力睁开眼睛看世界，试图了解世界。但受制于种种因素及条件不足，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的确不够。一百多年来，我们主要关心自己的事务，对外部的世界关顾甚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中国已深深地嵌入到世界之中，世界和中国不可分离。中国的发展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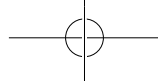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是世界的发展，世界要求我们准确地了解它，了解每一个国家，了解所有的地区。因此，了解世界和研究世界已经是中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职责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学术工具，它既是时代的禀赋，也是我们的自觉。当代中国要求我们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意识到。

但目前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尽管前辈学者们做出过许多努力，为我们积累了知识的基础；但就“世界”这个大范围而言，我们的知识仍然是有限的、局部的、不全面的和不深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欧美大国，即使对它们，我们的解也不够全面，而且经常浮于表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甚至对欧美非主流国家，比如南欧北欧，我们的了解就很少，也很少有人去做专门的研究。这种情况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的发展空间，与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不相称，与正在加强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与走出的现实需要不相称，也和中国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南辕北辙。不改变这种学术滞后的情况，将大大影响中国前进的步伐。

正因为如此，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就提上日程。国家领导人几次三番地强调要加强这方面研究，教育部在几年前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专家委员会，全国许多高校相继成立研究机构，目前已经有四百余个研究中心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培育或备案中心。北京大学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就是校领导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的体现，标志着北京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提升到学校建设的层面。

二、北大的优势

北大有悠久的学科传统，也有优良的学术传承。北大自建校之日起就敞开了大门，与世界的变化同步而行。中国的开放也是北大的开放，北大见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路



程。在建校之初，北大就设有万国史学门，开始对外国历史的的教学和研究；此后北大的世界史学科一直在国内遥遥领先，对世界多地区的历史进行长期研究。北大外国语学院则可追溯其历史到 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最早教授外国语言文学的官方学校，始终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前，北大外国语学院有近 60 个用于教学与研究的语种资源，通过获取一手文献资料对相关国别和区域进行深度研究，其中包括冷僻语言比如古冰岛语、古叙利亚语等，这在国内极为罕见。北大中文系大师辈出，其中如林纾、鲁迅、胡适等，都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也是引介外国文学的开拓者；现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仍是该系的重点学科，为国内学界所推崇。由京师大学堂“哲学门”演变而来的北大哲学系更是星光灿烂，涌现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其中外国哲学专业和宗教学专业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十分紧密，是今后工作的重要支撑点。除此以外，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所国际关系学院，它的研究成果和智库工作在国内外皆负有盛名，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北大法学院、北大经管类学科、北大政管学院、教育学院、社会学系、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等等也都有不少从事外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做出了众多成绩。由此可见，北大再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确实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问题是在现有行政体制和学科体系的配置下，人才和研究领域条块分割，不能形成综合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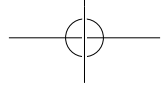
为改变这种状态，北大在过去几年已经付诸多种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北大建立了建立了外国历史与外国语言本科专业（简称“外外”），得到教育部批准，已经培养出一批学生。北大外国语学院自助设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已经招生、并且开始培养学生。考古文博学院与外国语学院共同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考古专业，走出国门，开拓外国考古的新方向。社会学系多年来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和博士生培养，取得诸多成果。

南南学院建立了发展学博士项目，力图扩大中国影响（学生均为外国学生），扩大国际交流。北大建立了燕京学堂，将中国学生与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放在同一个课堂，为相互了解创造空间。2016 年在学校领导直接指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委员会，统筹规划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建设工作。现在，北大已有约 50 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覆盖世界主要地区，其中有 20 个获教育部备案，这些都是今后开展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总之，北大已积累了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丰富资源，建立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为整合这些资源提供建制基础，从而为北大全面的学科调整与战略升级做贡献。

三、我们做什么

依照校领导的部署，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后，将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1）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独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人才培养，摸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培养新型研究人才，使其具备思考能力，也能胜任实际工作；（3）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成果的支撑保障下，就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向政府与社会献言献策；（4）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伸学术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播中国智慧和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研究院的工作将以学术研究为导向，重在基础性、独创性、前瞻性，做到理论与事实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我们将打破现有的学科界限，启动以问题引领项目的多学科研究模式，组建跨学科团队，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核心作用，在研究过程中培养梯队、发现人才。我们将尝试驻院学者与兼职教授制度，延揽各方人才，发挥各自特长，其中包括国际学者。我们将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天下论坛”、“博雅工作坊”、“新芽沙龙”等。“天下论坛”是大型学术研讨会，给海内外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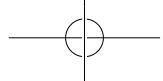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者搭建共商学术的讲坛。“博雅工作坊”是最经常的活动方式，旨在对人们最关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小型、深入、专题和对话式的学术探讨，在碰撞中形成思想。“新芽沙龙”是青年人的学园，为年轻学子提供小荷初露的平台。从这些活动中我们能选择出研究课题，蒐集研究成果，出版期刊、专著以及系列丛书。

二、人才培养既是工作的重点，也是长远的目标。在中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高素质区域与国别研究新型人才绝非易事。我们将努力为之。研究院成立后，我们将尽快制定培养方案，按照学校的要求，探索从本科到博士、博士后的培养流程，制定课程设置，研究适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教学内容与学习步骤，目的是打破单一学科的界限，尽可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其学以致用。我们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新型人才应该具有宽阔的知识结构，明确学习方向即对象国目标，掌握英语及对象国语言，在宽广知识的基础上培养一至二门专业特长（如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获该专业学位，学成后即可承担实际工作，也可成为专门学者。培养如此理想型人才需要有大投入，也需要长时间，北京大学愿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

三、智库功能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认为，智库功能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不流于表面，不就事论事，而是在对文化、历史、民族特点、信仰体系等有深刻理解的前提下观察和剖析社会、经济、政治等状况，提供可供决策的思考方式。因此，我们强调向咨询方提供“为什么”，而不是“做什么”。在我们看来，大学智库的主要功能应该在这里。

四、关于国内国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将努力运用各种资源，做好交流工作。此时我想强调的是：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第一次活动，这就是我们交流的开始，也是对我们巨大的支持。今后，我们期

盼你们的长久支持，我们会经常联系大家，寻求各种有效的合作。北京大学将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建设“双一流”大学的重点战略方向，对我们来说，任重而道远。我们知道责任的重大，因此会加倍努力、努力工作，努力完成这项任务。



二、学术活动

本次学术活动分为两个部分：“天下论坛”和“博雅工作坊”。

钱乘旦教授主持“天下论坛”，该论坛取意为“纵横天下事、汇聚八方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分别作了主旨报告，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前沿。

王缉思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基础”。王教授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学科。比如他研究美国，“美国学”能成一个学科吗？其中关键的问题是缺乏学科基础。因此王教授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应以一些传统的学科为学术基础，而不能以区域为学术基础。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才是真正的学术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研究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学者相互之间将无法交流，也很难把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统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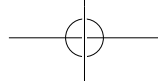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王教授以自身为例，根据其研究中美关系的经验，表示区域与国别的政治研究可以以政治学为基础。政治学包括比较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决策等等。但他发现研究不同地区或国别政治的学者却往往无法沟通。美国学者曾提出要突破独特性陷阱，即过于强调研究对象国的特点。王教授认为必须突破这个陷阱，研究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学者要经常交流，把学科基础定做得大一些。

王教授说：从横向来看，世界 190 多个国家，难道相互之间没有共性吗？今天的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法制国家，甚至是多元化的国家，这些都已经开始变成共同特征。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比如沙特就

不称其为民主国家，它不认为这是好东西。但总体而言，现代国家的政治特征是相似的，几乎都有内阁、议会、政党、法院，乃至表面上的三权分立。但王教授提醒我们思考，不同的制度间，如共和制和君主制，是否能直接笼统地判断孰好孰坏？此外，另一个共性的问题：有没有所有国家追求的共同的政治目标呢？他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强调共性，并不代表否认各国所存在的政治特色，例如丹麦、日本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它们的经验不一定能被其它国家所效仿，因为它们是单一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就不一定能照搬它们的经验。因此，学术基础的作用就应是既找到共性，又找出特性。

从纵向来看，即历史的角度，世界各地和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历史或者宗教历史都不一样，每个时代的主题也不一样，如现在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而前几个世纪则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可见，从历史角度出发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王教授看来，目前世界所出现的特朗普现象、普京现象，大概体现了当今政治的一个共性，即世界出现了强大的民粹主义，当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时，强人政治便重新再现。与以往不同的是，现今各国政治是相互影响的，不是完全隔绝的，如中国的政治发展可能影响非洲的政治发展，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可能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世界出现过三波民主化进程：第一波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后来被俄国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所打乱；第二波从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民主化成为趋势；第三波则出现于冷战结束之后。每一波民主化进程后都会出现一股回潮，而且有些国家也许从来没有把西方的民主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现在出现的状况是否说明西方民主受到强大的冲击呢？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因此，王教授总结出区域与国别研究至少应有四个维度的学术基础：一是地域维度，即横向的维度。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需要深入研究，且不能忽视其共性；二是历史维度，即纵向的维度。人类的整体历史事实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从相互隔绝的状态走向相互交往的状态，但却未必是相互融合。例如在美国，黑人大体还是跟黑人结婚，华人还是跟亚洲人结婚，而很少会和黑人结婚，所以人类的未来是融合还是分裂，这是一个问题，有许多因素难以突破，包括生理和心理的界限等；三是文化维度，如人种、宗教等问题，这一维度常常与历史维度相结合；四是社会科学维度，就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这四个维度意味着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要取长补短。他指出现今学术研究最大的困境不在于缺乏材料，而在于缺乏理论，缺乏整合，我们应巩固学科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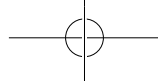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最后王教授对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区域与国别研究既要专家，也需要杂家。第二，应做好课程建设，相关专业的必修课可以和全校通选课相结合，或是设置一些学生需要修的基础课程，打破院系间的界限；第三，既要坚持国家的正确方向，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应注意不能以政治判断作为学术标准。如以一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来判断它，学者应超越政治，打牢学科基础，为国家广开言路。

沈志华教授以“做好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推进对中国周边国家的研究”为题，提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是历史研究。沈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中国所犯的很多错误都源于我们不认识这个世界，不了解我们周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或许中国应该反思：我们真的了解朝鲜、越南、蒙古、缅甸、印度、柬埔寨吗？他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些国家的认知真的少而又少，许多人以为只要提供经济援助，就能得到它们的友好相待，其实并非如此。基于这样的境况，沈教授强调加强对周边国家的研究，而对周边国家研究的基础就是历史研究，历史没研究清楚，对现状的认识必会经历曲折；同时，我们又不能以现状否

定历史，否则误解将不断加深。

沈教授认同刘新成主席关于智库型学者的观点，认为在这方面，大学老师的主要功能不是献计献策，即使献计献策，也只能是对基础认识的献计献策，而不是具体怎么做，毕竟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等部委所掌握的信息要比我们多很多。因此，学术研究应做的是进行基础分析，如历史研究是为现状研究做更深层的基础梳理，这才是学者的责任。他还批评了中国现存的评估体系，指出研究成果不应与领导批示挂钩，学者的研究，不管领导是否批示，都是自己的成果与贡献。学者为决策提供术支撑，一旦国家需要研究成果，学者却拿不出成果，那便是学者的失责。沈教授告诫学者们应踏实本分，做自己能做的、可以做的事，切勿盲目跟风。

至于研究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沈教授认为离不开一个国家的档案，离开了档案，我们就很难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回忆道，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一批“国别史”，他发现内容基本上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材料老旧，且没有原始档案的支撑。而二战后许多国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它们与中国的关系问题，都需要依靠原始档案进行解答。沈教授在搜集中国周边国家档案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其申请的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搜集和历史研究”早在2015年就得到中央的批准，目前第一期工作也完成。他特别提到在英国国家档案馆耗费8个月时间搜集到的50万页档案，涉及缅甸问题、西藏问题、巴基斯坦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反映当时英国殖民者在南亚殖民地的政策和处理边界问题、民族问题的方式，这些就是将来研究南亚问题的基础，我们或许能从中吸取大英帝国的经验，如怎么处理阿巴边界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科学边界”等。蒙古国、韩国、日本的档案也很丰富，因为它们的档案比较开放，解密年限短。例如，韩国的档案三十年就能解密，目前已可看到1987



年的内容，很快我们就能弄清楚中韩建交的内幕。虽然越南的档案现收集得不多，但近期两国关系缓和，相关的档案也已开放，沈教授的团队已获得大量的档案目录，并将派人前去整理，这些资料都尤为珍贵，是我们理解中越关系和越南土改等问题的关键。缅甸与泰国的档案开放亦相对正常，比较混乱的是尼泊尔和柬埔寨，据沈教授介绍，尼泊尔对档案缺乏管理，即使花钱也找不到，他甚至直接和尼泊尔外交部磋商，希望它把档案交由他整理，看不到档案，我们无法明白尼泊尔在中印之间的尴尬地位，也无法弄清楚当年中国是如何帮助尼泊尔共产党的。

沈教授表示档案项目的第二期已开始，准备搜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档案，这就需靠当地华侨的帮助。但除了国家档案，他认为还有许多民间档案颇有价值。研究东南亚问题主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华侨问题；二是“输出革命”问题，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但相关的材料在档案馆中保存较少，需要到民间寻找。沈教授曾认识马来西亚共产党北马局的书记，对其进行过多次采访，还获得三大箱往来的信件、日记、决心书、报告书等，这些对研究马来西亚共产党有着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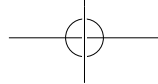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作了题为“继承北大优秀传统，开拓中亚区域研究”的演讲。他介绍了北京大学中亚研究的优秀传统与发展现状，强调了中亚研究的重要性，并对以后的中亚研究进行了全方面多角度的展望。荣教授首先追溯了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强调正是优秀的学术传统启发着学者不断保持学术敏感、不断推陈出新。荣教授回忆起北大各个学科的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他们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现有价值的研究素材，整理了包含有中亚研究的第一批敦煌学的著作、敦煌的汉解以及很多跟中亚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材料。他提出，如果说支撑中国历史学科四个新发现的新材料为：甲骨、简牍、文书和档案，那么在这四大项中，北大就抓住了两个项，如

上世纪20年代派出西北科学考察团，以及40年代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去做西北史记考察和西北科学考察，这些都体现了北大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对于新的材料有着相当学术敏感。

荣教授接着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中亚地区研究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难度，但学者们做了许多关于新疆的调查，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举了宿白先生做石窟寺调查的例子，谈到一代一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每年都有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学家等北大学者去中亚做调查工作，他们的足迹遍布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及蒙古等地，去到原始档案所在的地方做实地考察、搜集研究资料。

荣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传统，北大作为中国学术的核心重镇，对于许多领域的研究始终走在前端，如邵循正先生对蒙元史的研究、季羨林先生对中亚吐火罗语等的研究、周一良先生对于中国和亚洲关系史的研究、宿白先生对于佛教、考古的研究，张广达先生对于西域史地的研究等等，都为区域与国别史研究打下了基础。北大一直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对新问题的敏感和切入，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入流”。虽然北大拥有强大的文科传统和多学科的学术优势，但他认为从区域国别研究角度来看，我们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建设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正是要推动这些工作。

接着荣教授强调了中亚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中亚主要是现在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还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他提出中亚研究是有有关中亚各种研究的总成，包括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宗教、政治、经济、法律、国家关系等各个方面，中亚作为一个研究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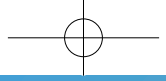
可以把不同的研究在这里交织互动，产生跨学科的增长点。荣教授表示中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区域，是中西方文明互动与交流的通道、是宗教文明交汇与竞争的场所、是不同民族交融与征战的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等因素使中亚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中亚也是我国周边不容忽视的一个场域，研究中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处理与周边的关系。丝绸之路研究是我国和中亚各国都关心的问题，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息息相关。而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包括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文化交流等，对今天的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建设等都有所启示，这些也是历史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对于今后的中亚研究，荣教授分享了他的思考与展望。他认为任何一个学者以个人之力无法做到包罗万象，因此必须进行学术合作，打破现在的学科体系，以地域为单元、综合各个学科，做好中亚区域研究；同时应大大加强资金和人才的投入，加强队伍、资料、语言建设上的力度。荣教授提出，今后中亚研究的重点要放在当代，放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他指出只有加强对中亚的研究，才能加强文化理解，促进沟通。我们的研究视野已经从“看自己”到“看世界”，北大也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加强对中亚地区的研究工作十分关键，而北大恰好有过去的传统，有能力推进中亚研究。荣教授强调在“一带一路”的号召下，北大在丝绸之路研究上有良好基础，许多学者对丝绸之路都有很多贡献，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应该打破过去仅仅强调历史与文化友好的方面，而去关注全方位的、真实的中亚情况，中国在提倡“和平友好五项原则”时对方国家怎么看我们，怎么看待“一带一路”，怎么看待中国强调丝绸之路，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此外，荣教授认为北大有着深厚的中国史籍研究的传统，这对于中亚历史研究而言是一种优势，但弱点则在中亚的语言上，虽然北大外国语学院有优秀的波斯语教师，

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语方面，还需引进人才，加强培养。博士后的培养和博士生的招收同样是重要的环节，同时也需要像“国学院”“高研院”一样的“中亚研究院”来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跨学科的科研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他指出当前不少研究都集中于各自的领域，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建立学术交流机制很重要。积极主动与中亚地区建立交流关系，同时也要与欧美、日本等加强交流，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积累学术资源。

主旨报告结束后，现场的师生还与演讲嘉宾进行了简短的互动。对同学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来是否招收博士后的问题，钱乘旦院长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还有老师询问沈志华教授除了大量周边国家的档案外，还有什么文献非常重要，沈教授回答称，最重要的应属中国的档案，但中国档案的开放比较严格。最后一个提问是关于北大中亚语言教学的现状。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回答了这一问题，她表示在中亚语种方面，北大已有成熟的语种专业20个，不仅包括中亚语言，而且已经开设了包括阿塞拜疆语、格鲁吉亚语，高加索地区的语种等课程，希望将来弥补与中亚相关的其他专业语言的短板。



揭牌仪式

记录：刘波 整理：李威 审稿：钱乘旦

天下论坛

记录：张睿、刘萍 整理：李威、凡萦慧、滕菲 审稿：咎涛

